

胡愈之

民盟历史人物

于友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胡愈之

于友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愈之/于友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1

(民盟历史人物)

ISBN 978 - 7 - 80256 - 044 - 4

I. ①胡… II. ①于… III. ①胡愈之(1896~1986)

—传记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4900 号

出 版 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陈 佳
封面设计	齐立娟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044 - 4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裨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事”,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人物》和《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人物》与《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人物》
《民盟历史文献》 编委会

序

胡愈之(1896~1986)是我国上世纪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新闻记者,政治评论家,出版家,文字改革专家。他毕生致力于启蒙、推动先进文化,推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贡献巨大,被誉为一代巨人。他在1986年初去世以后,备受人们怀念,尊为先驱和楷模,纪念活动不断,纪念出版物无数。可见宣扬这位先驱者,一直具有启迪后人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为展现胡愈之先生的真实全貌,群言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本全新的胡愈之传记,本书作者应约补充和修改1991年出版的《胡愈之传》旧稿。我在出版社责任编辑樊伟同志的协助下,勉力改写,去芜存菁,并增加一些新的资料和感悟。我在原稿最后还新写了一章——第30章“巨人晚年新思维”,以显示胡愈之作为一代巨人,一生思想上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他晚年经过反思取得的这些新思维,在我们当今坚持解放思想和需要理论创新的年代,是特别值得宣扬的。考虑到书稿的内容已有不少变动,这本新书经我和群言出版社商定取名为《胡愈之》。

和胡愈之同时代的文化界前辈夏衍同志，非常了解胡愈老。我把他所写纪念文章列在新书《胡愈之》的目次的前面，作为“导读一”；费孝通同志所写的纪念文章《一代师表》作为“导读二”，以便帮助作者评价胡愈老，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本书的主人公。

《胡愈之》一书的写作，实际上已经历了近 20 年的时间，写作的材料大多是胡愈老本人晚年所写《我的回忆》和他的亲友们所提供。往年，胡愈老夫人沈兹九和其他热心的同志，如郑森禹、张楚琨、王仿子、陈原、王健、高天、谷斯范、胡序威和胡国枢等，都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今年能完成书稿《胡愈之》，还缘于群言出版社的推动。出版社编辑在接到书稿之后，结合书稿内容配上了许多有关的图片，增加了形象的记录，这就使书的文字记录丰富多了，并使胡老的光辉事迹和形象更加鲜明了。我衷心感谢所有这些多年来和我合作的同志。

胡愈之毕生奋斗的事迹非常丰富，他一生事迹中发扬的创新精神尤其感人，需要我们后人不断调查和研究，继续传布和宣扬，以便更加有利于当今的启蒙和思想解放，有利于我国的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进展。我在完成编写《胡愈之》之后，深感自己由于年迈，书的缺点难免，还请各界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于 友

一代师表

费孝通*

胡愈老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来受人敬爱。他固然没有在教室里讲授过课程,但是受到他教益的人遍及海内外。以我自己来说,小愈老十五岁,在学生时代就是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和他所参与主办的《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这些刊物推动了当时像我一样的千万青年前进的步伐,靠拢革命的主流。愈老在30年代初期所写的《莫斯科印象记》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愈老在中国土地上日夜劬劳,埋头苦干,为改变这个几千年来封闭的传统社会使其成为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他鞠躬尽瘁、奋斗终生,不愧是一代师表。

*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我和愈老初次见面已是在解放战争中间的1947年春。我重访英伦返国途经新加坡,愈老和沈兹九大姊在机场接我,一见如故,逗留期间,愈老为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顿开茅塞。回想起来,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里我能比较坚定地选定我的立场,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会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解放后,由于同在民主同盟内工作,我和愈老接触的机会是经常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愈老领导下做盟内的文教工作。他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对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入人民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和所有的问题,是有深刻体会和同情的。我愿意致力于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与愈老的启迪和鼓励分不开的,虽则我在这项工作上没有能做好,有负愈老的期望。

在十年动乱最艰苦的日子里,愈老心中始终关怀着知识分子的劫难,特别是盟内的老同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暴露后,愈老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授意下,恢复了在京民主人士学习活动,在惊风暴雨里,为党的统一战线保住了一线生机。1972年我从“干校”回京后,定期参加这个小组学习会,切肤地感到了同志间的温暖,激发了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为我在大局扭转后立即全力投入工作的决心打下了基础。

愈老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对人推心置腹,体贴入微。勇于拯人之危,善于解人之困。他总是用朋友的身分帮助别人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不居功,不求名,助人为乐。他早在30年代前期就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为党工作,但从不脱离群众,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剖析是非,以理服人。在他公开党员身

分之前,竟有许多至交不知他是党员。他完全以至诚感人,取信于人,身教力行,树立模范,使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他是为群众敬爱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

缅怀先哲,思虑万千,仅以此时此刻的悲思和前瞻来表达我对愈老的哀悼和崇敬,并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中华民族的脊梁——胡愈之

夏 衍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论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历史上也经历过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这就是 70 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革命，和接着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这个时代也的确产生了一批思想、学识、才艺上卓绝的巨人——在知识界，胡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应运而生的巨人。

1927 年四一二事件之后，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经杨贤江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愈之同志，初次见面，谈得不多，不久他就逃亡到法国去了，这一年我刚入党，年少气盛，一次和贤江同志闲谈，认为愈之是《东方杂志》主编，在危难时刻他不该离开这个岗位，贤江同志沉思了一下，然后从书架上找出一份同年 4 月 14 日的

《商报》，低声说：“你看看这篇‘抗议信’，这是四一二那一天晚上愈之起草的。”这是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檄文：“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无此横暴，五卅惨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而我神圣之革命军人，乃竟忍心出之。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这封抗议信是写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的，签名者七人：郑振铎、胡愈之、章锡琛、冯次行、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当时，宝山路上的血迹未干，正是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刻，公开发表这样一封抗议信来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罪行，的确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也由于刽子手陈群查明了这封抗议信是愈之起草的而要加以暗害，他才听从了郑振铎的劝告，离开了上海。这件事距今已经 60 多年了，当时愈之还没有入党。记得抗战初期周恩来同志曾和我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愈之同志在法国三年，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了法国的工人进步运动。我还听说过，巴金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也是经过愈之介绍的。1930 年他经过德国、波兰到了苏联，1931 年 2 月回到上海，正碰上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遇难之后不久，一方面白色恐怖严重，另一方面又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全盛时期，愈之巧妙地运用他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办的《社会与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莫斯科印象记》。这

本书哄动了知识界，一年之内重印了五版，鲁迅先生写过：“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大约是10月下旬，我在内山书店遇到夏丏尊先生，他约我到开明书店去吃饭，这是相隔4年之后再次和愈之见面，同席的都是开明书店同人，有叶圣陶、章锡琛、吴觉农、徐调孚、宋云彬等，当时愈之已经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了。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而西欧和美国还处在经济大萧条之中，席间谈到国事，难免会流露出一些悲观情绪，而愈之却非常敏锐地指出罗斯福的“新政”已初见成效，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日益加剧，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团结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苏政策。他不断地抽烟，低声细语地说，日本侵略东北，最终的目的在于进攻苏联，所以我们应该和苏联复交，争取苏联的援助。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就预见到东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的远见卓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淞沪战争之后，我和愈之有了更多见面的机会，有时在吴觉农家里，有时在开明书店。我参加了电影工作之后，有一次我和他谈起明星电影公司的老板张石川和周剑云约我和钱杏邨、郑伯奇写剧本的事，他很有兴趣地问我：他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政治背景。我坦然地说：正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左联的人，所以才要我们帮他们出主意，写剧本的。他忽然高兴起来，对我说，你们做得对，这就说明不当权的资本家也可以在爱国抗日的前提下合作的，当然他们的进步是有限度的。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愈

之为什么对这件事感到兴趣和高兴呢,因为这件事正好证明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一种即将到来的新的形势,这就是:当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国难当头的时刻,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争取到反日反蒋这方面来的事实。九一八、一·二八之后,人民群众普遍地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王明“左”倾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形势,还在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和“武装保卫苏联”这一类不切实际的口号——也就在这个时期,“左联”发动了一场反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因此愈之在《东方杂志》和《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主张争取广大群众,联合抗日的文章,也被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刊上对他进行点名批评——1931年10月的《红旗月报》第23期《满洲事变中各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政府》一文中,居然把愈之看作是第三党改组派的人物。值得钦佩的是愈之并没有被错误的批评吓倒,他还是不断地发表文章,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民族资本家开始对国民党不满,国民党内部也有“不愿做奴隶的人”,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就证明了这一论点,而这一场淞沪战争又得到了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的支持,这一切也就说明了当政的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复苏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甘心让日本独吞中国,所以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也将逐渐显露。在三十年代初期王明路线占上风时期,在进步文化界能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远见卓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

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通过张志让先生认识了国民党中的“亲苏派”孙科，接着担任了法国在远东唯一的通讯社“哈瓦斯社”的中文编辑主任，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如路易·艾黎、史沫特莱、伊罗生等，这样，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如椽的笔力，写出了大量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旺盛的工作能力，1933 年秋，中国共产党吸收他为特别党员。

从 1933 年到 1935 年 2 月，党在上海地下组织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损失重大，过去常说，王明左倾路线使红军损失了 90%，地下党损失了 100%，事实上，单说上海，尽管中央上海局和江苏省委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党组织并没有全被消灭，工会（马纯古等）、青年团（陈国栋等）、文委（周扬等）也还在人自为战，继续工作，特别是和地下党有关系的外围组织，却正利用了民族矛盾上升的机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永远也不能忘记愈之同志所作出的难以估计的巨大的贡献。愈之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一些党员，已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十分困难。这一年里，我除继续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外，还努力多方联络有志反蒋抗日的人士，力图在文化界首先能酝酿组织起一个抗日救亡的团体，以使在万马齐喑的形势下，救亡运动能有新的兴起。同时，我也以极大的热情来发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以扩大这一块宣传抗日救国的文化阵地。继

1933年创刊的《文学》杂志后,在1934年9月,又创办了《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刊物,1935年还创刊了《妇女生活》。这些刊物大都是我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这是近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一项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个时期在上海新建了三家进步书店。即“读书生活”、“新知”和生活书店,前两家是地下党人徐雪寒、黄洛峰办的,生活书店则是邹韬奋在愈之同志的支持和筹划下办起来的,这几家书店出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这个时期由这几家书店冒着风险出版的。在这一段时期内,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过,现在形势变了,要联合抗日,单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出书和办杂志,首先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他们的接受水平,“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理,切不可居高临下地训人”,当他筹备出版《世界知识》的时候,他单独约我谈话,他说:“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登台之后,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现在急需要有一本专门介绍和评论国际知识的杂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他要我在创刊号上写文章,我就用韦戡的笔名,写了一篇论美国电影的文章。叶圣陶先生说过愈之同志的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这是对愈之立身行事的最真切的评价,圣陶先生说:“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

他的似乎少见。”不仅生活书店和它刊行的许多杂志是他“联系筹划下办起来的”，更应该说，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救国会，抗战初期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青年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以及文化供应社，《南侨日报》等等，也无一例外地都是他精心策划，组织起来的。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1937年冬，京沪沦陷之后，他奋不顾身地留在上海，组织人力物力，迅速翻译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接着又奔走呼号，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鲁迅全集》。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精神，在近代知识分子中，真可以说是无可伦比的。

1934年，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愈之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巨人，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九八八年严冬